

明清賞玩文化對18世紀朝鮮文人之影響*

金熙敬**

<目次>

- 1、前言
- 2、明清賞玩文化之形成與流行
- 3、明清賞玩文化流入18世紀朝鮮社會及其影響
 - 1) 明清書籍與古董書畫的流入及流通
 - 2) 賞玩文化之流行及其影響
- 4、結語

1、前言

文人文化的形成及其流行是明清社會文化的重要特點。明清時期由於陽明心學的流行、商品經濟的發展、印刷術的進步……等社會上變化，對文人的創作傾向產生了變化。傳統上被儒家視為“玩物喪志”的“物之賞玩”，與隨之出現的“嗜癖”傾向卻成為當代文人文化的新潮流。由於明清賞玩文化的流行以及相關作品的出版與流傳，進而影響了18世紀朝鮮的文人社會。在18世紀之前的朝鮮，由於中韓兩國政府的干涉與限制，立足於“大明義理”的朝鮮文人對清政府的充滿反感，使得明清書籍文藝傳入朝鮮的情況並不興盛。到了16世紀以後，反對道學重視學風的一些文人，逐漸擺脫道學，開始講求純粹的文學藝術，明清書籍的傳入有逐漸增加的趨勢；經過17世紀末，朝鮮克服兩次大亂帶來的國家經濟的損失，經濟情況穩定起來，因此大量的明清書籍與文藝流入到朝鮮；到了18世紀，這樣的氛圍達到高潮，以京華世族

為中心，文人社會裏明清書籍的閱讀及收藏、古董書畫的收藏及鑑賞等就逐漸流行了。文集、叢書、小說、文選、詩選等各種明清書籍廣泛地流入到朝鮮文人社會裏，並且受到很大的歡迎，改變了朝鮮文人的文章、思想及生活方式。各式各樣的書籍可以充足渴望新思想、新知識的朝鮮文人的要求。

本文擬從明清賞玩文化之形成及流行來出發，探究明清賞玩文化流入18世紀朝鮮社會的過程及其影響。

2、明清賞玩文化之形成與流行

晚明文人士陳繼儒描寫當時文人的生活如下：

凡焚香試茶，洗硯鼓琴，校書候月，聽雨澆花，高臥勘方，經行負暄，釣魚對畫，漱泉支杖，禮佛嘗酒，晏坐繡經，看山臨帖，竹喂鶴，右皆一人獨享之樂¹⁾。

明中期以來，“閑雅”的生活形態格外盛行。茶、酒、花、鳥、琴、書、畫、古董等物之賞玩，因之出現的“嗜癖”傾向就是當時文人文化的重要體現。所謂的“嗜癖”，本是人們在生活中對某些事物或行為愛好的表現，是人之常情的表現；但如果它逐漸演變成社會某個階層人士所追求的生活樣貌及價值觀時，這樣的嗜癖就有了特殊的意義²⁾。袁宏道說：“余觀世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的人，皆無癖之人也。”³⁾張岱說：“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⁴⁾張潮說：“人不可以無癖。”⁵⁾“癖”是對某個事物的喜好特別深而瘋狂地沒入到不

1) 明·陳繼儒，《太平清話》卷十二，《寶顏堂秘笈》，《百部叢書集成》第十二函：18(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2) 張忠良，《晚明文人的嗜癖言行》，《臺南女院學報》第二十三期(1994年10月)。

3) 明·袁宏道，《好事》，《瓶史》，收錄於《寶顏堂秘笈》，《百部叢書集成》第九函：48(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4) 明·張岱，《祁止祥癖》，《陶庵夢憶·西湖夢尋》(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Brain Korea 21 Project in 2008.

** 大田大 中國言語文化學科 講師

顧一切的程度。這在某些人的眼中是缺點。然而，在明清文人的社群裏，嗜癖已經成爲有個性、有風格的文人不可缺少的條件。

其實，對整個中國文化而言，古董書畫的鑑賞等賞玩文化的形成卻不能說是明清士人創造的。這些都是承襲以前文人的文化、重新詮釋、再進一步發展和現實生活相互整合的結果。物之賞玩之中，透過古董書畫之類長物的鑑賞來建構一個超脫於世俗的“雅”的生活情境，以此作爲文人生命的寄托，更可說是明清文人文化的重要內涵之一。明清文人所建構起來的生活文化，可以說就是在追求閒隱的生活理念上，用以寄托個人的真情來經營閒隱生活、賞玩“長物”，呈現出一種離於繁瑣現實、去俗入雅的“雅”的意境。

所謂“長物(Superfluous Things)”⁶⁾，來自於《世說新語》裏王恭的故事，本來是應當隨時被忽略、被遺忘之多餘無用的存在，擁有“不役於物”的曠達態度，始具有人文氣息，這是中國文人的物我觀傳統。千餘年後，晚明的文震亨在特殊的時代氛圍下，企圖扭轉這個典故的傳統意涵。他援引這個典故，鄭重其事地爲其著作命名爲《長物志》。與王恭不同的是，文震亨不但注意這些“長物”，還慎重地將閒適遊戲等多餘無用之物一一作誌品評書寫。《長物志》，以室廬、花木、水石、禽魚、書畫、器具、衣食、舟車、蔬果、香茗等生活物系列，鋪展出一個符號體系，以建築體式、庭園造景、山水遊動等不同的單元，擺設出模範的生活架構⁷⁾。“長物”這個觀念的變化，明顯地展現出中國文人對物質觀念的改變。

這種雅的賞玩活動可能起源於有財富的士大夫之愛好，但它們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後，就已經成爲其興之所至的風雅之舉。⁸⁾

有明中葉，天下承平，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評書、品畫、淪茗、焚香、彈琴、

5) 清·張潮，《主角與配角》，《幽夢影》(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花不可以無蝶，山不可以無泉，石不可以無苔，水不可以無藻，喬木不可以無藤蘿，人不可以無癖。

6) 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7) 參見毛文芳，《物·性別·觀看——明末清初文化書寫新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30、58、59頁。

8) 王鴻泰，《雅俗的辯證——明代賞玩文化的流行與士商關係的交錯》，《新史學》第十七卷第四期(2006.12)。

選石等事，無一不精。而當時騷人墨客，亦皆工鑒別、善品題、玉敦珠盤，輝映檀坵。若啓美此書，亦庶幾卓卓可傳者；蓋貴介風流。雅人深致，均於此見之⁹⁾。

由“士大夫”到“騷人墨客”，有了一種專門化的“賞玩文化”之形成及其相關意涵、價值的轉換。明代中葉以後，江南一帶爲中心的出版業、城市文明之繁榮帶來了整個社會的活力，過去少數文人擁有的精緻文化趨於世俗化。

賞玩文化的發展，其實一直處在市場化、商品化力量的包圍下。明末商人，在當時有特殊的文化性格，多以“買而好儒”的精神投入文化活動中，既有高財可周旋於天下名士間，並介入商品經濟發展的文化消費市場¹⁰⁾。因此，所謂文人文化，尤其是賞玩文化的發展，是在文人與商人交雜的處境中，雅、俗關係不斷交纏、游移、辯證的過程。¹¹⁾

明末清初這樣的社會氛圍加上印刷術的進步推動了各種圖書的出版及編纂。除了內府官刻書籍外，私人出版的書籍也大量出來，促成了圖書的流通與銷售，在大城市裏往往有專門流通圖書的書商，也開始出現了藏書家。由於雕版印刷術的發明流行，私家藏書之風，宋代就開始興盛。然而，兩宋時期，書籍本身，尚未形成被賞鑑的對象，要到明代中晚期，始開始重視刻版。印刷術的發達、印刷數量的攀升、閱讀人口的激增、生活日用的需求、書估量販的手法等，使得書籍及其附載的知識，已溢出了文化傳承的目的，成爲可販賣的商品。印刷術的發達與大量出版，改變了書籍創造的形式，也打破了文化權貴的迷思，書籍編撰者比過去更能意識到廣大讀者的存在¹²⁾。此時期，圖書的體類和樣式很豐富，涉及古董書畫的鑑賞、齋室的佈置、瓶花的設計、園林的築造、山水的遊歷、飲食的講求、美女人物的品評等各項。當時流行的書籍文本，透過物的細節來建構了明清文人文化的全貌。

9) 清·伍紹棠，《長物志跋》，《長物志》，收錄於楊傢駱主編，《藝術叢編》第一集(臺北：世界書局，1962)，第29冊。

10) 毛文芳，《物·性別·觀看——明末清初文化書寫新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23頁。

11) 同註 8。

12) 參見毛文芳，《物·性別·觀看——明末清初文化書寫新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10-11頁。

3、明清賞玩文化流入18世紀朝鮮社會及其影響

明清書籍的流入及流通與藏書家的出現、古董書畫的收藏及鑑賞，是18世紀朝鮮文人社會的重要現象。本節則以明清書籍與古董書畫的流入及流通、明清賞玩文化的流行兩個方面，來探究明清賞玩文化對18世紀朝鮮文人文化的影響。

1) 明清書籍與古董書畫的流入及流通

明清賞玩文化的流入可以從書籍的流傳、兩國官員或者文人之間的交流、民間商人的活動等很多面向來討論。其中，當時文人社會裏最普遍、影響力最大的流入方式是“書籍的流傳”。

中國的漢字傳到韓國以來，韓國文人一直接收中國的書籍。尤其，朝鮮文人的書籍收入是特別熱烈的。明末清初的文人姜紹書記錄朝鮮文人的書籍購買熱如下：

朝鮮人最好書。凡使臣入貢，限五十人，或舊典，或新書，或稗官小說，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寫書目，逢人遍問，不惜重直購回，故彼國反有異書藏本。¹³⁾

明末以來，以江南地區為中心，各種圖書的商業出版及編纂甚為繁榮。¹⁴⁾在全國各地出版的書籍都集中到當時的首都——北京，¹⁵⁾到18世紀末，北京的書籍市

13) 明·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卷上，再引於김영진, 《朝鮮後期の 明清小品 수용과 小品文의 전개 양상》(고려대 국문과 박사논문, 2003), 25頁。

14) 大木康在《陳繼儒與馮夢龍——明末出版文化史小考》(《中國學報》第三十五輯，韓國中國學會，1995)裏，據楊繩信所編《中國版刻總錄》(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考察各時代書籍刊行的情形，說明如下：“總數共3094種，而其中2019種是明末嘉靖至崇禎時期所刊行的。在這僅一百年當中，所發行的書籍數量，是宋、金、元至明正德的六百年間的一倍以上。”

15) 明·胡應麟，《經籍會通》，《少室山房筆叢》(台北：世界書局，1963)：燕中刻本自希，然

場琉璃廠開始興盛。但是，清政府不允許外國使臣隨便出去買東西。¹⁶⁾因此，所謂“序班”的下級官吏幫朝鮮使臣買了各種物品。當時渴望新思想、新知識的朝鮮文人，都願意找機會去中國親眼看到中國的文物。他們從中國回來之後，把自己的經驗都記錄下來。我們在他們留下的燕行錄裏，可以看到關於序班的描寫。

序班即提督府書吏，而久則間有陞為知縣者。我國人欲知燕中事情，則因序班而求知。……其家多是南方，而書冊皆自南至，此屬擔當買賣，如我國所謂僧人。而譯官居其間，使臣欲購冊子，必使譯輩求諸序班。彼此互有所利，故交結甚深。¹⁷⁾

序班者，胥吏也。使行入京，禮部調序班十人，更番直宿于衙門，以備諸官役使。皆從外省選上，俸食清貧。數十年以來，凡燕貨之稍雅者，皆令胥班主其貿易而食其剩餘。如書籍書畫筆墨香茶之屬，他商僮不敢與焉。……余往琉璃廠及隆福市。序班恐余潛買書籍，必跟隨伺察。或諭解之，終不聽。是以惡余游觀，常欲沮尼之。¹⁸⁾

序班職能通常是負責朝會和宴饗等禮節有關，為配置於鴻臚寺或會同館官署之基層官員。據18世紀朝鮮文人的記錄，他們在國家的默許下，一邊監視朝鮮使臣來做自己的公務，另一邊卻幫朝鮮使臣做購買物品的中價者角色。而且他們除了書籍之外，還獨佔書畫、筆墨、香茶等有關文人雅趣生活物品的購買中價。

除了使臣之外，常常跟著使臣入燕的譯官也是書畫古董流通的另一個主體。一般來講，使臣是為了朝鮮政府的需要或者自己的需要購買書籍，不過譯官收入書籍的目的有點不一樣。他們也會為自己的需要買東西，又會賣那些東西來做生意。他們從中國買書籍回來，然後由書籍中介商“書僮”擔任國內流通。

在這樣的情況下，明清時期刊行的各種書籍大量流入到朝鮮，18世紀朝鮮文人通過書籍的閱讀來接受明清文人的賞玩文化，以藏書為自己的生活樂趣。那些書籍裏

海內舟車輻輳，筐篋走趨，巨賈所攜，故家之蓄錯出其間，故特盛於他處。

16) 朝鮮·洪大容，《衙門諸官》，《湛軒書外集·卷七·燕記》(韓國文集叢刊，民族文化推進會)：貢使入燕。自皇明時已有門禁。不得擅出游觀。為使者呈文以請或許之。終不能無問也。

17) 朝鮮·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下》，《陶谷集》卷30(韓國文集叢刊，民族文化推進會)。

18) 朝鮮·洪大容，《衙門諸官》，《湛軒書外集·卷七·燕記》。

面，有之前都沒有接觸到的新思維、知識、文體——陽明學、考證學；西方的天主教、地理、科學技術書；小品、小說、戲曲等等，其中值得關注的是叢書的流通。明清時期，由於商業出版的繁榮、閑隱雅趣的文人文化、考證學的發達，叢書的編撰特別盛行。當時在朝鮮文人社會特別流行的叢書如下：陳繼儒的《眉公秘笈（寶顏堂秘籍）》，陶宗儀、陶珽的《說郛》及《續說郛》，商浚的《稗海》，王謨的《漢魏叢書》，吳震方的《說鈴》，陸楫的《古今說海》，張潮的《昭代叢書》，張潮、王暉的《檀几叢書》等。¹⁹⁾這些叢書體現明清文人的生活全貌，所以朝鮮文人除了個人文集之外，通過這些叢書的閱讀來接受了明清文人的賞玩文化，進一步模仿了明清叢書的體例來編撰叢書。

2) 賞玩文化之流行及其影響

明清書籍的收入及流通導致朝鮮文人讀書傾向的變化，改變了朝鮮文人的文章、思想及生活方式。晚明文人的小品，標榜生活的藝術，包括居室、園林、飲食、書畫、旅行、音樂、養生等的介紹及批評，大多鼓勵人生世間，應及時及充分的享受人生。²⁰⁾很多文人從借著讀書來修身養性轉變到借著讀書來獲得喜悅，模仿明清文人雅趣的生活方式。傳統上被儒家視為“玩物喪志”的茶、酒、花、鳥、琴、書、畫、古董等物之賞玩，因此出現的嗜癖傾向就成為了當時文人文化的新潮流。換言之，當時朝鮮文人社會裏他們的“癖”不只是一種賞玩而已，更是達到一種別人謂之瘋狂的程度。²¹⁾

要購買、收藏大量的書籍與古董書畫，必須要有巨萬的財富及顯赫的家世背景。因此，可以充足這些條件的京華世族為中心，這樣的風氣開始流行起來了。

19) 參見김영진, 《朝鮮後期の 明清小品 수용과 小品文의 전개 양상》(고려대 국문과 박사논문, 2003), 58頁。還有，金榮鎮整理幾位文人收藏或閱讀的中國書籍目錄，收錄在這篇論文裏。

20) 周志文, 《散文的解放與生活的解脫》, 《晚明學術與知識分子論叢》(臺北: 大安書局, 1999)。

21) 정민在《미처야 미친다(不狂不及): 조선 지식인의 내면읽기》(서울: 푸른역사, 2004)裏介紹了朝鮮後期文人的嗜癖傾向。

朝鮮文人南公轍(1760-1840)在《自礪銘》裏把自己的生活描寫如下：

置亭龍山廣陵之間，多植梅菊松竹，時以幅巾野服，出往逍遙。客至焚香，清坐討論經史，傍列古今法書名畫銅玉彝鼎，評品賞玩。²²⁾

南公轍描寫的生活就是曾經陳繼儒講過的晚明文人間隱生活的體現。²³⁾南公轍是個京華世族，不但他的父親文清公南有容(1698-1773)是當時朝鮮君王正祖(1752-1800, 朝鮮第22代王(在位: 1777-1800))的師尊，而且他自己也是奎章閣的抄啓文臣。他甚為欣賞悠閒的生活，特別嗜好收藏古董書畫，把自己家裏的建築稱之為古董閣、書畫齋、古董書畫閣等。

余自少癖於書畫，見有賣名品者至，脫衣裘而易之，聞人家有善本，則輒往觀。皆有品題，其或出於古今記譜而及見者，亦著跋尾，有若干篇，藏于家。²⁴⁾

他不但收藏書畫，而且要品題、寫跋尾。通過他的書畫跋尾，可知他對書畫的嗜好。此外，他為了提高對書畫古董的知識，參考了很多關於書畫、金石、鼎彝等的書籍及譜帖。²⁵⁾

這些從最上層士大夫開始的賞玩文化，漸漸擴散到整個社會階層，在18世紀朝鮮文人社會裏面形成一個新潮流。物之賞玩讓文人脫離於性理學的思考，關注生活周邊的瑣小事物了。正祖認識到文人社會裏的這些新潮流，以為文人的意識變化總會引起封建社會秩序之混亂，在“文體反正(1791)”的旗幟下開始制約他們。通過下面的文章，可知正祖對當時朝鮮文人生活的看法。

大抵近時之士，不獨於文章為然，平居鼓琴瑟，列銅玉，評書品畫，焙茶燃香，

22) 朝鮮·南公轍, 《自礪銘》, 《穎翁續藁》卷5(篆經齋藏本, 純祖22年(1822)), 29頁。

23) 同註 1。

24) 朝鮮·南公轍, 《洪氏寶藏齋畫軸又》, 《金陵集》卷23(韓國文集叢刊, 民族文化推進會)。

25) 김성진, 《조선 후기 文人들의 生活相과 小品體 散文—南公轍의 예를 중심으로》, 收錄於 안대회 외, 《조선 후기 小品文의 실체》, (서울: 태학사, 2003)。

自以為清致文采，而後生少年，往往多效嘖而成習者。此與向日邪學其害正而違道，大小不同而為弊則一也。可勝歎哉。²⁶⁾

唐學有三種。有多著明清間小品異書者，有專尚西洋曆數之學者，有衣飾器皿之喜用燕市之物者，其弊則一也。²⁷⁾

他指出賞玩文化與文章的關係，因為社會及意識心態的變化也導致文體形式上的變化，故當時文人社會裏所謂“小品體”文章的創作便開始流行起來了。他怕文人之收藏明清小品異書、專尚西洋學問、喜用中國事物傾向。正祖以為，這些變化是從明清書籍的閱讀起源的，²⁸⁾所以禁止明清文集、小說及叢書的流入，讓他們用傳統古文來寫文章。其實，文體反正的動因是天主教的傳播，²⁹⁾但是，正祖沒有直接鉗制天主教，而制約文人的文章。

日前見抄啓文臣南公轍對策，引用稗官文字，上齋生李鈺表作，純做小品體裁。鈺則一寒微儒生，雖不足深責，猶且另飭津長，并與陸庠詩賦嚴禁。如許不經之體，則名以閣臣，又名以文清之子，悖家訓負君命，為此犯禁之事，寧不痛駭乎？古之儒者，亦多引異端之書，真所謂何須問主人也？異端無論，雖稗官，其文或近理，其言或益人，亦非嗜而模象，而偶然下筆者，則不過是公罪也。彼公轍策中所引古董等語，雖出詆斥之意，若不嗜其學，豈有見其書之理乎？況究其出處，背於理害於人，不翅若淫聲邪色，特召抄啓文臣，嚴加申飭，仍使公轍，革心歸正之前，入不敢登筵席，出不敢拜家廟。此豈特為一公轍之文體，而若是哉？³⁰⁾

文體反正的開頭是提及“古董書畫”的南公轍之策問³¹⁾與模仿小說體裁的李

鈺(1760-1810)之表文。李鈺只是一個“寒微儒生”而已，然而，南公轍是當時朝鮮最上層人士，對其他文人的影響力甚大。正祖擔心，從最上層士大夫開始的明清書籍之閱讀及賞玩文化之流行導致整個文人思想的改變，總會引起以性理學為根幹的封建社會秩序之混亂。文人的思想變化一般在自己寫的文章裏明顯地表達出來。外表上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沒有理念性的小品與賞玩文化，最後會引起整個社會的改革，這就是正祖最憂慮的事情。³²⁾

雖然沒有人因文體反正受到生命的威脅，即使之後朝鮮文人對明清賞玩文化及小品文有興趣，但也不敢表達出來。南公轍等被正祖受到制約的一些高官世族，文體反正之後都奉命而排斥了賞玩生活及稗官小品。

然而，因為這只是針對高官世族思想的制約而已，故對於一般知識分子(士人階層)或者中人、庶孽階層(下級官吏)而言，他們還可以繼續追求物質賞玩的文化，把它當作素材，用小品文的方式寫出來。對他們來說，“癖”、“疵”的追求是一種對不允許他們展開自己力量的當時社會現實的抵抗行為。這些文化傾向繼續到19世紀，綿綿不休。

4. 結語

閑隱生活的追求、古董書畫的鑑賞等文人文化雖然不是明清時代的專有物，然而，明清時期的文人，承襲以前文人的文化、重新詮釋、進一步發展，和現實生活相互整合起來，形成一種社會特點。這些明清賞玩文化的流行所引起的新文人文化與諸多出版著作影響了18世紀朝鮮的文人社會。文人社會裏，明清書籍的閱讀及收藏、古董書畫的收藏及鑑賞等就逐漸流行，終於，改變了朝鮮文人的文章、思想及生活方式。

雖然，明末的文人文化在滿清入關，新政權統治之初期，因為城市生活的蕭條、清

26) 朝鮮·正祖，〈日得錄〉，〈弘齋全書〉(韓國文集叢刊，民族文化推進會)。

27) 同上註。

28) 〈正祖大王實錄〉卷47，正祖21年(1797丁巳)11月8日癸酉條：近日士趨之不正，多由於小品之書，所謂小品之書，即明、清文體之支流也。

29) 1791年，珍山郡的天主教徒尹持志和權尚然廢祭焚主，因此，政府把他們處以死刑，燒掉天主教書籍。

30) 〈正祖大王實錄〉卷36，正祖16年(1792壬子)10月24日己丑條。

31) 朝鮮·李德懋(1741-1793)，〈與朴在先齋家書〉，〈刊本雅亭遺稿〉卷7：大抵，此事創始於南直閣對策用古董書畫四字。

32) 關於文體反正，可以參見강명관, 〈문체와 국가장치 — 正祖의 文體反正을 둘러싼 사건들〉, 收錄於안대희 외, 〈조선후기 小品文의 실제〉, (서울: 태학사, 2003)。

政權的嚴厲管制及士風的轉趨嚴肅等因素之作用，而一度趨於沉寂，但是文人文化並未因政治環境與文化氛圍的轉變，而全然蕪廢摒棄，以致消聲匿跡。³³⁾ 朝鮮文人社會也有同樣的挫折，朝鮮的君王正祖在“文體反正”的名目下制約文人的思想、生活及文學。然而，這些文化傾向繼續到19世紀，以一般知識分子或者中人、庶孽階層為中心，繼續追求物質賞玩的文化，把它當作素材，用小品文的方式寫出來。“癖”、“疵”的追求成爲一種對束縛、壓迫他們的當時社會現實的抵抗行爲了。

< 參考文獻 >

明·陳繼儒，《寶顏堂秘笈》，《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臺北：世界書局，1963。
 明·張岱，《陶庵夢憶·西湖夢尋》，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清·張潮，《幽夢影》，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
 楊傢駱主編，《藝術叢編》第一集，臺北：世界書局，1962。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台北：世界書局，1963。
 毛文芳，《晚明閑賞美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
 _____，《物·性別·觀看—明末清初文化書寫新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
 周志文，《晚明學術與知識分子論叢》，臺北：大安書局，1999。
 王鴻泰，《雅俗的辯證—明代賞玩文化的流行與士商關係的交錯》，《新史學》第十七卷第四期，2006.12。
 _____，《閑情雅致—明清間文人的生活經營與品賞文化》，《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十二卷第一期，2004。
 張忠良，《晚明文人的嗜癖言行》，《臺南女院學報》第二十三期，1994.10。
 朝鮮·正祖，《弘齋全書》(《韓國文集叢刊》，民族文化推進會：www.minchu.or.kr)
 《正祖大王實錄》卷36·47(《朝鮮王祖實錄》：<http://sillok.history.go.kr/main/main.jsp>)
 朝鮮·李宜顯，《陶谷集》卷30，《韓國文集叢刊》。
 朝鮮·南公轍，《穎翁續藁》卷5，篆經齋藏本，純祖22年(1822)。

33) 王鴻泰，《閑情雅致—明清間文人的生活經營與品賞文化》，《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十二卷第一期(2004)。

_____，《金陵集》卷23，《韓國文集叢刊》。
 朝鮮·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7，《韓國文集叢刊》。
 朝鮮·李德懋，《刊本雅亭遺稿》卷7。
 안대회 외，《조선후기小品文의 실제》，서울：태학사，2003。
 정민，《미처야 미친다(不狂不及)：조선 지식인의 내면읽기》，서울：푸른역사，2004。
 김영진，《朝鮮後期の明清小品 수용과 小品文의 전개 양상》，고려대 국문과 박사논문，2003。
 송혁기，《17세기말~18세기초 산문이론의 전개양상》，고려대 국문과 박사논문，2005。
 강명관，《조선후기 서적의 수입·유통과 장서가의 출현—18, 19세기 경화세족 문화의 한 단면》，《민족문화사연구》Vol.9，1996。
 日·大木康，陳繼儒與馮夢龍—明末出版文化史小考，《中國學報》第三十五輯，韓國中國學會，1995。
 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 국문요약 >

文人文化의 형성과 유행은 명청시기 사회문화의 중요한 특징 가운데 하나이다. 陽明心學의 유행, 상업경제의 발전, 인쇄술의 발전 등 사회전반에 걸친 변화는 당시 문인들의 사상과 문화 및 창작 경향을 바꾸어 놓았다. 이전에는 '玩物喪志'라 하여 금기시하였던 사물에 대한 '玩賞', 특히 '古董書畫'의 수집 및 감상과 그로 인해 나타나게 된 '癖'과 '疵'의 추구경향이 당시 문인문화의 새로운 조류를 형성하게 되었던 것이다. 사실 이러한 완상문화는 명청시기 이전에도 있었던 것이지만, 이전에는 주로 소수의 귀족들과 상층 사대부를 중심으로 유행했던 것이 명대 중엽 이후 강남 일대를 중심으로 한 도시문화의 번영이 가져온 사회의 활력을 바탕으로 전체 문인사회와 부유한 상인계층으로 확산되었다.

명청 문인들의 완상문화는 사신단을 따라 연행길에 올랐던 문인들과 그 시기에 출판된 서적들의 유통을 통해 18세기 조선의 문인사회에까지 영향을 주었다. 처음에는 주로 경화세족을 중심으로 조선 문인사회에 명청 서적의 열독과 수집, 고동서화의 수집과 감상 등의 완상문화가 유행하기 시작하였고, 그 안에 담긴 새로운 사유와 지식, 문체 등은 조선 문인들의 문장과 사상 및 생활방식을 변화시켰다. 그러나 이러한 문인사회의 변화

를 감지한 당시 조선의 왕 正祖는 이것이 장차 봉건사회질서의 혼란을 가져올 것이라 여겨, '文體反正'의 기치 아래 문인들에게 제약을 가하기 시작하였다. 문체반정은 주로 상층의 사대부들을 제약하기 위한 수단이었으므로 이후 상층 문인들의 완상문화는 확연히 위축되었다. 그러나 19세기에 이르러 완상문화는 일반 문인들이나 중인·서얼 계층으로 널리 확산되어 소품문이라는 문체를 빌어 표출되었다. 그들에게 있어 완상문화의 추구, 즉 벽과 치에 대한 추구는 자신의 역량을 마음껏 펼칠 수 없었던 당시 사회 현실에 대한 일종의 저항이었다.

중심어 : 명칭 문인, 완상문화, 古董書畫, 癖, 疵, 18세기, 조선 문인, 文體反正

원고접수일	2008. 1. 2
심사일정	2008. 2. 18
1차수정	2008. 2. 28
게재확정	2008. 3. 7
출간	2008. 3. 30